

兵临城下 里应外合 胜利解放大埔县城

饶 练

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加紧策划内战。

在国民党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1949年4月21日晨，我南下大军在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胜利渡江，彻底摧毁了蒋介石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书记魏金水即于1949年4月23、24日，在大埔县的大埔角村区党委机关召开了解放大埔县城的决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边区党委和闽粤赣边区纵队的领导同志和黄维礼、罗芬（恭照）、卓立（禹轮）等人。会上由罗芬、卓立两人汇报县城的敌情和党的统战策反工作，以及城区周围的支前准备等。魏老和区党委、边纵的领导听了，一致认为解放县城的条件完全成熟，而且认为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很大。魏老指出，我们要力争不花什么代价和平接管大埔城，但要立足于打，要做好打的充分准备，才能有备无患。魏老还认为可以不调边纵主力，只由地方武装十三团、十七团

和独六大队就可以，会议讨论和决定了预定解放的时间，调动集结的部队，组建军管会领导班子，配备接管团人员，赶刻军管会印章，印好军管会布告，做好支前后勤准备，做好内线工作等。会议还讨论了解放大埔城的重大意义。魏老指出：“解放大埔县城对整个闽粤赣边的形势发展将会起重大作用。”魏老再三强调，一定要把各项准备工作认真按时做好，做充分。并决定火速调动部队，限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限10天至两周内做好各项准备。会后，各方分头按决定做了准备工作。区党委调动了韩东的十三团、闽西的十七团和粤东的独六大队，并以边纵司令部名义，下达了按规定时间和指定地点集结部队的命令，同时成立了指挥部和军管会。军管会主任黄维礼（兼部队指挥）、副主任范元辉、罗恭照（即罗芬）。解放大埔城的时间最后确定为5月14日拂晓。13日晚，指挥部、军管会、接管团、民工队按规定时间和地点进入包围圈。罗芬和卓立（卓禹轮）在决策会议后回永和埔县委做准备工作。卓立深入到城区附近西河等地做好群众支前工作，与指挥部、军管会、接管团保持了密切联系。罗芬继续进城，加紧做好城内的内线工作，常奔走于永和埔县委机关（陈卜坑）和县城之间，同时也按规定时间去古斋堂和镰子岗找指挥部联络碰头，汇报城内情况，接受任务。

罗芬5月12日同指挥部碰头后，于13日赶回县城，那天下午，他向江雪民传达了攻城的时间，要江于14日晨4时带队到五里亭起义，那里会有人来接应。江雪民听了十分高兴，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傍晚，罗芬到资深楼饶龙光家，把攻城的时间告知了饶龙光，并要他做好策应的准备。饶龙光

听了很高兴，留罗芬住在他家，以便商量，便于联络。罗芬因考虑到饶龙光政治上完全可靠，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相信他能够独立处理问题，所以没有住在他家。罗芬又因急着要去邬若愚家，继续做邬若愚的工作，故在与饶龙光谈完话后便到邬若愚家，邬是县城保安大队长（即营长），是守城敌方的主力，有三百余人。许多碉堡炮楼多是邬若愚的部属驻守。罗芬与邬若愚是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他知道邬的工作很重要。邬告诉罗，现在的兵很难带，自解放军渡江及南京解放，他的队伍思想混乱，士气很低，开小差和请假不归的很多。罗未将攻城时间告知邬，但向他谈了大军渡江后的形势。罗告邬，据我观察解放军可能很快会来解放县城，邬听了很紧张，罗劝邬最好带队起义。邬摇头，表示不好办，说他刚接任营长不久，手下没有心腹，有些连排长不听他的话，不买他的帐。罗要他在解放军攻城时下令不抵抗，放下武器，并建议他把连排干部找来做点工作。邬在当晚10时许，把连排长找来开了个会，罗芬在楼上，虽未参加会议，但能听到楼下会议讲话的声音，他听到邬若愚在会上说：“如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报告，发生什么情况时，要听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有私自行动”。意思是要打不打要听他的。当晚罗芬被留在邬若愚家过夜。但他翻来覆去，一夜未合眼，考虑着即将来临的重大事件。

5月14日晨4时，江雪民按时带一个排从西门驻地出城前往指定地点五里亭举行起义。不久，李其揆率领的武装和他们接上头，由李其揆负责接收，并与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5时许，指挥部发出进军号令，一时枪声四起，各围城部队

同时打枪，打一阵喊一阵话；再打一阵，再喊一阵话，喊话是：“放下武器，投降缴械”，宣传投降不杀，优待俘虏政策。约5时至6时之间，饶龙光即到县府找饶邦泰，叫他赶快下令投诚，绝对不要打枪。经商量后，由饶邦泰下令驻守各炮楼武装，叫他们不要抵抗。饶龙光也及时通知警察局长韩祖信及秘书饶尚南、总务饶尚儒等要他们绝对不准开枪，守好档案，集中枪弹，听候解放军接收。同时，叮嘱县府各科室及直属单位，要他们保管好档案、公物、公款，迎接解放军进城。饶龙光与饶邦泰布置后，一起返回饶龙光住地资深楼，等待罗芬联络，听候解放军进城接管。

天亮后，枪声基本停息。天亮前，几次密集的枪声是我军打的，守城敌军除黎世良部向仙基桥山顶朝天发射了三发枪榴弹，及个别炮楼的个别敌兵盲目朝天打了几枪外，全无抵抗，全部放下武器，缴械投降。警察局的数十名警兵在我内线工作人员的掌握下，也一枪未发，把枪弹集中到一个房间内，列队迎接解放军。

邬若愚听到枪声后，被吓得全身发抖，躲在一个角落里，象软瘫的死蛇一样说不出话，罗芬几次叫他赶快打电话，下令要他的官兵放下武器，投诚起义交枪，他吓得总像没有听到，只是一味向罗芬求饶，要求罗芬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他保证放下武器，洗手不干差事了。罗芬再三向他宣传我军政策，消除他的顾虑，要他下令投诚，但他始终惊慌失措，唉声叹气，要求饶命，而没有去挂电话。罗芬看到时间不早了，约9时左右，他便离开邬若愚家，沿高福路、大华路、学前街，从西门出城去找指挥部。10时左右，经五里亭到了鹤子

顶，找到了指挥部，向指挥部汇报了城里的情况，并留在指挥部随指挥部行动。

在攻城中，独六大队首先进城。约8时许，独六以强大的政治攻势结合猛烈的军事进攻，迫使渡头岗山顶炮楼守敌二十余人投降缴械，接着进入街区，顺利占领了银行、警察局，并派人与指挥部联络，约11时许进占县政府，发现守卫县府的敌军的枪弹已集中放在地上，教育科长陈振邦奉命将县府大印交给独六政委张克昌，张克昌表示，要陈振邦把饶邦泰和逃散人员找回后才能接收。随后独六收缴武器，并打开监狱，放出犯人。不久，县府背后炮楼之敌也放下武器，投降缴械。黄维礼率指挥部及军管会人员（包括接管人员）进城，在县府与独六会合，独六将接收的武器弹药移交军管会，这时，大约是中午12时左右。

当日清晨，我和张奎、丁汉等人几个通讯员到梅县松源梅州地委机关（我们刚好在那里开完地委扩大会议）出发，11时到达坪沙，与中共埔永梅县委机关的有关同志一起，于下午3时赶到县城，在陈家祠与张克昌、巫少平等独六的同志会合，随后罗启如、饶沾、谢天等14位同志邀我到附近的照相馆照了一张“解放大埔留影”的相。晚饭后，我和罗芬、卓立、陈鸣等去资深楼看望了饶龙光。大家均为解放大埔城而高兴。15日，军管会通知饶邦泰、饶龙光等到县府办理政权移交手续，经过几天时间即移交完毕，县府的枪枝、弹药、文书、档案和各种物资、财产、文物等都保管得相当完好，没有什么破坏和损失。在移交期间（约一周），饶邦泰住在县府的行动是自由的。移交完后，他回到自己家里住，

一切同样自由。

邬若愚未参加移交。15日上午，罗芬去探望邬若愚，未看到他，只见他的妻子把郭的驳壳枪和子弹交给罗芬，邬还留了一张纸条说：“从此之后，我不再干国民党的差事，决心回老家去种田了”。

大埔县城的和平解放，震动了闽粤赣边区。1949年5月25日印发的中共闽粤赣边区领导机关写的《进攻和接管大埔县城的初步总结》中说：“大埔敌人最后的和最大的反动堡垒，大埔县城已于本月14日为我闽粤赣边人民解放军所占领，这是我边区第一个和平接管的县城。”又说：“此次英勇进攻和接管大埔县城的各个部队和军管会，是基本上完成了边纵司令部给予的光荣任务。这是边区的一个大胜利。这个胜利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在我边区创造出了一个小北平式的榜样”。罗芬同志写的《大埔解放前后的有关情况》一文，魏金水同志在1988年1月8日阅读后给罗芬的信中说：“你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大埔城的解放是里应外合和平解放的，如果和平解放不行，当时我们是作了足够攻城准备的”。1979年11月国务院某个部门根据闽粤赣边许多老同志提供的材料，为一位曾与饶龙光合作共事过的老同志作干部结论时，也提到了饶龙光的有关历史说：“1949年大埔城解放时，就是饶龙光向我们提供敌人的情况，和替我们传信给饶邦泰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认为《进攻和接管大埔县城的初步总结》和魏老给罗芬同志的信，以及有关同志给饶龙光在大埔县城解放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1949年8月3日，香港《工商日报》二版刊登了有关大埔城解放的消息说：“大埔县长饶邦泰因共军攻城时，放弃职守，被撤职查办”。这条消息也从反面证实了饶邦泰在我军攻城时没有抵抗，受到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处分。

大埔县城的和平解放是：“兵临城下，里应外合”的结果。我认为主要有下列三个原因：

一、军事上的原因。大军渡江后，我军势如破竹，敌军土崩瓦解，士气低沉，军心涣散。大军渡江南下，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3日又杭州解放，上海、武汉、南昌等大城市也面临解放，我军正以秋风扫落叶的强大攻势向江西全面进军，向福建挺进。那时闽粤赣边的敌人更加惊慌，军心更加动摇，毫无斗志。另一方面，我边区解放军力量日益强大，敌人到处被歼。5月9日，我边区武装某部以优势兵力，攻下了潮汕南山县最后一个反动堡垒——县府所在地，全歼了顽抗的敌军，生俘了国民党县长，创造了一个“小天津式”的榜样，给边区一切反动派指明了“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死路。使边区的敌人认清了只有放下武器，投诚起义或交枪投降，才有出路。这时的大埔县农村已完全解放，孤立的县城长期受我围困。外援断绝，经济陷于绝境。同时，我军士气极高，各部队接到边纵解放大埔城的命令后，都坚决执行命令，迅速行动，忠于职守。

二、政治上的原因。在两倍于敌人的武装力量攻城时，我军向敌人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约法八章》，各地捷报频传，深入人心。迫使敌人分化瓦解，各寻出路，纷纷要求谈判搭线。那时大埔城内敌

人和各界人士绝大多数人要求和平解放。在统战策反情报工作中，在内线工作上，都起到了里应外合的积极作用。

三、边区党委领导的正确。边区党委根据形势的发展，从实际情况出发，及时果断地作出了解放大埔城的英明决策，并作好了两手准备，发扬了我方的优势，抓住了敌人的弱点，掌握了有利时机，下定决心，集结兵力，加强内线工作。结果兵临城下，里应外合，和平解放了大埔城，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大埔县城解放后，蕉岭县城也于同日解放，驻蕉岭的省保安独立第一营宣布起义；5月17日驻梅县的省保安十二团团长沙魏汉新与梅县县长张君燮在我军策动下也宣布起义；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洁之在兴宁起义；梅县兴宁宣告解放；5月22日边纵一支队率二团、四团又解放了平远县城。这时兴梅地区全面解放。闽西的地方实力派傅柏翠、专员练惕生与前任专员李汉冲也于5月22日在上杭宣布起义，参加起义的有上杭、武平、龙岩、永定、连城等五个县，整个边区形势一片大好。

从大埔县城和平解放的过程来看，大埔县城中共的白区工作是卓有成绩的；党在城内外的统战情报策反工作是做得好的；饶龙光在大埔县城和平解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大的。我认为，我攻城部队是顺利完成了进攻与和平接管县城的光荣任务，这个胜利是巨大的。

（1989年7月4日脱稿于北京）

正确决策 给大埔人民带来胜利曙光

——庆祝大埔解放40周年

罗恭照

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的基础上，即将向南进军，将要夺取全国胜利的一年，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和毛泽东同志1949年发表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向中外宣布：“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中共华南分局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中央的指示，曾多次指示华南各地党组织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于1949年1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粤赣湘边、闽粤赣边、桂滇黔边纵队，以加强领导人民解放战争，同时指示，要首先解放粤汉路东的闽粤赣湘数十县及路西的二、三十县，以包围广州，夺取广州，迎接大军南下，并且号召各地要大力举办各种干部学校，大量培养干部，研究城市政策，为解放接管城市做好准备。

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和闽西地委正是根据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和中共华南分局的指示，对解放大埔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我参加了解放大埔的一个侧面的一部分工作，现将我亲身经历和所知道的情况，作个简要记述，以庆祝大

埔解放40周年。

到边区党委开会

自1948年5月起，中共闽西地委分配我担任永和埔县委执行委员兼白区工作特派员，假以商人身份掩护，负责做湖寮和县城茶阳两地的清报、统战和策反工作。1949年4月中旬末，大军渡江前夕的一天，我刚好去岩上陈卜坑向中共永和埔县委汇报工作。县委副书记廖信同志告诉我，说接闽西地委通知，要我和卓禹轮同志（地委秘书长兼永和埔县委宣传部长）去边区党委开会，要我们准备全面汇报大埔县城的情报、统战和策反工作，等卓禹轮同志一到，就马上动身。我听到这一消息，心里真是万分高兴。这一天，我原来是早有预料的，现在终于来到了。按照规定，我平时都是和廖信同志联系，向他汇报情况，再由他转报给上级组织，我从未向地委和区党委直接汇报过。1948年12月，有一次，组织派钟盈同志约我到百侯，要我汇报湖寮的情况，于1949年1月10日刘永生同志率领部队就解放了湖寮。根据这一经验，这次组织正式通知我们去区党委开会，并且明确告诉我们要全面汇报县城的情报、统战和策反工作情况，很显然，这就意味着边区党委、边区纵队要准备解放大埔县城了。不然，为什么会通知我们直接到区党委去汇报呢，而且时间又限得那样紧迫。一想到这里，心情就格外兴奋，情绪激动得实在难于抑制，急切盼望卓禹轮同志早点到来。

傍晚，老卓带着警卫员卓乃生同志按时来到了，不出所料，卓禹轮同志所想的和所预料的，和我完全一致。他的心

情也是特别兴奋，特别激动，都说此行必有重大任务。当天晚上，我们俩人点着煤油灯，认真地凑合，准备好了汇报材料。第二天一早起来，我们吃过早饭，就离开了县委机关。一行三人从陈卜坑出发，抄山区羊肠小道，经大北坑、新村、旧寨出侯北，这一带山区小路，原是我们熟悉的地方，打游击时，无论白天黑夜，经常在这一带出没。说更早些，我1934年进百侯中学读书时，当时在校执教的陶行知“生活教育社”的老师经常利用假日带领我们到这一带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远足、野餐。所以，我不仅对这些地方比较熟悉，而且对这一带山村一直留有极美好的印象和特殊的感情。这时候，正是杜鹃花、黄枝子花满山遍野盛开的季节，枝子花的扑鼻清香阵阵吹来，加上路旁的潺潺流水声，树上鸟儿的啾啾歌唱声，构成了一幅自然界的美丽图画，真是太迷人了。它使我们忘记了旅程的远近，消除了跋山涉水的疲劳感。不过，这时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闲情逸致去欣赏如此美丽的景色，我们的心早就飞向急盼到达的边区党委所在地——大埔角了。

解放大埔的决策会议

我们到达大埔角的第二天，即4月23日，区党委就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会议由边区党委书记、边纵政委魏金水同志主持，有区党委和边纵以及粤东地委的几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开始由我和卓禹轮同志汇报县城的情况，包括敌方党政军方面情况和城内群众的情况，以及城区周围群众支前准备工作情况。魏金水同志和参加会议的区党委其他同志听

了汇报以后，一致认为解放大埔的条件完全成熟，而且认为争取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很大。估计城里敌人对我们是不致于，也不敢负隅顽抗的。魏金水同志还详细地、客观地分析了大埔周围的情况，认为大埔东面的闽西，国民党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傅柏翠、李汉冲、练惕生已早派人通过关系与我香港华南分局和边区党委联系，酝酿起义；大埔西面兴梅地区国民党军政方面人员也早在吴奇伟、李洁之等人领导下派人与我们联系酝酿起义；至于大埔南面，即韩江下游潮汕的敌人，我边纵主力部队已出击到那里，他们已成为惊弓之鸟，自顾不暇，是不可能成为我们解放大埔的救援的。因此，魏金水同志认为解放大埔的军事行动，可以不调边纵主力回来，只就近调我们各支队的几个团就完全可以完成这个任务。魏老强调：我们要力争不花什么代价，和平解放、接管大埔；但要立足于打，要做好打的充分准备，才能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会议当即作出决定，预定解放的时间，调动集结部队，组建军管会领导班子，配备接管团人员，以及赶刻军管会印章、印制布告等，许多具体事项都作了研究和安排。会议还讨论了支前、后勤准备工作，并且对解放大埔的重大意义作了估计。魏老认为：大埔的解放对整个闽粤赣边区的形势发展将会起重大作用。所以他交待大家，一定要把各项准备工作认真按时按质按量做好，做充分。散会后，就十万火速调动部队，限定时间到指定地点集中；各项准备工作均限在10天到两周内做好。散会后，我画了一张敌军驻扎地点、兵力配置和连队负责人的简图，交给魏老。

开完会的当天傍晚，吃过晚饭后，我和卓禹轮、卓乃生

同志三人就离开区党委，星夜赶路，回永和埔地区。

再 次 进 城

攻城部队按规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古斋堂集中后，至发起攻城之前，我曾两次到古斋堂与攻城指挥部联系，汇报情况和领受任务。其余时间，我都在县城，继续做工作，主要还是找原来联系的三个重要关系人：

一是县政府的主任秘书饶龙光。他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共老党员，早期曾经当过中共大埔县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张鼎丞同志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失去组织联系，但他以后在南洋和在国内生活、工作的漫长岁月中，一直直接间接地与中共保持联系，仍葆其革命本色，一直为党继续做工作。1942年“南委事件”组织停止活动后，我和廖信、饶练、张华等同志，都曾经到他和罗贤工作的广东阳江县政府隐蔽，并得到饶龙光的各种支持和帮助，使我们与阳江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配合，开展了党的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利用了我们在县政府中的有利条件，特别是饶龙光的关系和胆略，私放了关押在监狱中的游击队员、政治犯。所以，对饶龙光的思想政治状况和本质，我们是完全了解的。我们在大埔县城国民党党、政、军内部能够顺利地开展统战策反工作、搜集情报，主要也是由于他的关系。敌方的全面详细情况，也都是他无保留地详实提供的。对国民党大埔县长饶邦泰的工作，也主要是通过他去做。因此，对解放大埔的许多事情，我进城去，不但能够顺利进行，而且和他也可以坦诚地交换意

见。我在大埔解放的前一天去找他联系，告诉他我们明天要来解放县城，他听了很高兴，并要留我住在他那里，以便详细研究。但这一次太遗憾，我没能留下来（以前每次进城，我都住在他家里），因为我急着要去找保安营长邬若愚做工作。当时我考虑到，邬负责的保安营，也叫县保警大队，是国民党政权警卫县城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县城的东、西、南、北门，许多碉堡炮楼，都是他的部队驻守，我们解放大埔城顺利与否，举足轻重就同这个大队的关系很大，所以比较起来，在时间这样紧迫的情况下，抓紧做好邬若愚的工作是很关键的，因而我不敢留住任饶龙光同志家里，急着去找邬若愚。

二是布置江雪民起义。江雪民，是县城茶阳人，城市贫民，在家闲居无事，生活十分困难，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强烈不满，急切盼望解放。他过去曾在国民党乳源县警察局当过雇员，政治面目灰色，派他打进敌人阵营去工作很适当。我就同饶龙光商量，在1948年底分配他到保警大队当连指导员，要他负责做他所在连的瓦解、策反工作。他打进去后，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在我们攻城的前一天，即5月13日下午，我找他，告诉他明日（14日）我们要来解放县城，要他于14日凌晨4时带领他的部队撤出西门外五里亭起义（他们连驻守县政府和西门），我们派人接应。他领受任务之后，十分兴奋，情绪高涨，表示保证坚决完成任务。14日我们攻城时，他果然按照规定带一个排撤出西门起义（因为他进连队时间不长，又无助手，未能掌握全连人马，结果只一个排起义）。他那个连的连长黎世良，是在连队时间很长的老连长，很顽固反动。

三是做保安营长邬若愚的策反工作。13日下午我找了饶龙光和江雪民后，就去找邬若愚。邬若愚是大埔湖寮杨梅田人，和我家只隔一条河，算是邻居。在湖山官学读高小时，我和他又是同班同学，关系算是比较好的，他本人和他家庭的情况我都了解。1948年冬，我负责白区工作的重点从湖寮转移到县城后，就一直重点做他的工作。由于我在“南委事件”后于1944年春曾参加了罗明同志组织的贩盐生意，人们都把我看成一个做食盐生意的大商人，因而出了名。没有想到，我这一个历史“身份”，对我这次接受组织分配做白区工作，竟成为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刚好革命老妈妈“细姆”（饶八英同志）家里有一套饶彰风同志留下来的西装和皮鞋，“细姆”拿给我化装成一个很象样的“大商人”，使我公开进出县城活动而无人怀疑过，就连当时的县长饶邦泰也深信不疑（县城解放后，我们叫饶邦泰来军管会办理清点移交手续时，他看到我就说：“好象面很熟……你不是做盐生意的吗？怎么你也在这里呀！……”）。我去找邬若愚，也就是以做食盐生意商人的假身份去找他的。我们虽然是小时候的同学，又是邻居，但各走各的路，多年不见了。他对我这个“商人身份”也是深信不疑的。我和他接触，开始就以这个身份要求他对我的“生意”给予“帮助”、“保护”，同时我又对他说，我的“生意”常穿走于饶平、大埔之间，经过游击区，就乘机把游击区的“见闻”和解放战争形势向他宣传，讲党的政策。接触了多次以后，了解了他的思想状况和改变了他一些认识，他知道我在游击队中有“认识”的人以后，他反过来希望我帮助他打通一些关系。我们攻城

前夜的13日晚，我到 he 家里。他住在靠近东门的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小楼房，楼下是他们的大队部，他夫妇俩住在楼上。他留我吃饭后，闲扯了一阵，慢慢和他谈到我大军渡江后的形势。我说：“看来最近形势比较紧张，据我观察，游击队可能很快会来解放县城”。他听了，思想很紧张，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说你最好带领队伍起义。他面有难色，摇摇头，说很难办。因为他1948年冬才接任这个职务，他自己手下没有心腹可靠的人，情况不熟，许多连排长还不太买他的帐。这个大队有3个连，共300多人，武器装备算是比较好的，有一定的战斗力，是敌方警卫县城的主要力量（此外还有一个县自卫大队100多人，没有什么战斗力），他到任至这个时候还不足半年，要他率领全营起义，也确实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怎么办呢？现在时间这样紧迫，就只有希望他在我们攻城时放下武器，不抵抗。以后经我和他仔细研究商量后决定，要他当晚把他各连的干部找来开会，做点工作。他分别通知后，到10点多钟，那些人陆续来了。那时，我在他楼上找个能听到楼下讲话声音的地方藏着，静听他们开会发言。开始，各连汇报情况。谈一般问题时，争相发言，情绪很热烈；一讲到形势，就鸦雀无声，一片寂静（据邬若愚原先告诉我，自我大军渡江南下以来，他们的队伍思想混乱，士气低沉，开小差和请假不归的经常发生，他说现在的兵很难带）。他们的会议冷场了好久，以后听到邬若愚向他们宣布：“……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报告，发生什么情况时要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有私自行动……”不久就散会了。邬若愚不敢号召“起义”，也

不敢提出“交枪投降”，也没有说要“坚决抵抗”。我想，他当时也只能那样说，意思就是要打，还是不打，都要听命令，这样讲不会出毛病，也为出现紧急情况时——我们攻城时做好应急的准备。散会后不久，我们就分头休息了。当夜我住在邬若愚隔壁房间，当然邬若愚不知道我们明天就要攻城了。他虽然心情沉重，但还不会太紧张，不久就睡着了。然而，我躺在床上，却一直翻来复去睡不着。因为几个小时以后就要发生的重大事情，在我脑子里不断地翻腾着。我从未经历过这种紧张的战斗场面，对枪响后会出现的种种情况，很难揣测，但我却总是满怀信心，紧张而又迫切地等候着即将来临的胜利曙光。……

解放的枪声震撼了整个山城

5月14日拂晓前，凌晨5时，我们攻城的枪声响了，火力很猛。步枪、机关枪打得很密集，象春节一大早放鞭炮一样。这清脆、激烈的解放枪声震撼了整座山城，宣告了旧中国反动统治在大埔这片土地上的结束。邬若愚被我们攻城的密集枪声惊醒，吓得半死。我立刻起床去看他，叫他赶快命令他的部队放下武器，投诚起义。我看他浑身发抖，软瘫得象一条死蛇一样，躲在他房间的角落里，好久说不出话来。我一再催促他去挂电话、下命令。他吓昏得好象没有听到，只是一个劲地唉声叹气，向我求饶说，要保住他的命，说他从此不干这差事了。不管我怎么讲，他都没有去挂电话，一直发抖，脸色铁青。我们攻城时的枪声开始非常密集，听得出来，敌人没有还枪抵抗（攻城的枪响后，县府秘